



一个老记者的经历

张西洛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个老记者的经历

张西洛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封面设计: 丁 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老记者的经历/张西洛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4

ISBN 7-80002-696-5

I. 一… II. 张… III. 记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446 号

一个老记者的经历

张西洛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5.75 字数 121 千字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4000 定价 4.20 元
ISBN 7-80002-696-5/G·203

作者简介

张西洛(1918~)四川重庆人。中学时代即为当地报纸撰稿。1936年春,因参加重庆市中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校方开除。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重庆救国会,负责下属的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队等进步社团的领导工作。8月,任重庆齐报记者,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5月任重庆新民报记者。1939年6月至12月,在西北战场采访,曾经访问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叶挺、彭雪枫等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和李宗仁、傅作义、卫立煌等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将领,在该报发表了几十篇战地通讯。1939年9月以新民报记者名义,和中央社、扫荡报记者一道,在延安访问毛泽东。访问内容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收的《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除继续担任新民报记者外,还参加过成都工商导报的创办和领导工作,并独立创办过江津日报、星期快报、万象十日画刊、立言报等报刊。建国后,继续担任工商导报经理。1952年,调到北京,在连环画报担任文字编辑。1956年转到光明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从事国内政治和统一战线方面的宣传。1982年调离光明日报社,从事人民政协报筹办工作。现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虽已年逾古稀,仍坚持在第一线采访,足迹遍及20几个省、自治区;并到罗马尼亚、泰国、斯里兰卡、香港、匈牙利等地访问。仅1987年一年,就在该报发表了十几篇消息、通讯和人物访问记。

(引自1987《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

目 录

一晃六十年·····	(1)
重庆有过这张报纸·····	(18)
在新民报社	
记抗日战争中的报纸义卖·····	(22)
访彭大将军·····	(26)
在延安访问毛泽东·····	(29)
毛泽东——掌握时机的大师·····	(38)
我在新民报遇到好机运·····	(47)
在中央日报的十个月·····	(51)
想起了江津日报·····	(57)
别具一格的星期快报·····	(65)
在立言报的遭遇·····	(71)
艰苦创业、顶风前进的工商导报	
解放前的战斗历程·····	(76)
工商导报与王达非·····	(90)
成都万象十日画刊·····	(94)
在光明日报社	
餐桌上的采访·····	(97)
专访荣毅仁·····	(101)
专访陈叔通·····	(104)
侧记成都会议·····	(106)
陈毅的一次讲话·····	(110)

三十年前藏区行.....	(112)
生与死的搏斗.....	(116)
战“三衰”.....	(125)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	(129)
有创新的胆识,才有创新的成果	(133)
双周座谈会.....	(137)
对控制人口增长的看法和建议.....	(140)
出席亚太人口会议归来.....	(143)
在人民政协报社	
人民政协报的历程.....	(145)
邓颖超关心新闻工作.....	(149)
她在祖国大地上奔波.....	(154)
我设计并实践过一个副刊.....	(159)
作一个知识多、交游广的记者	(163)
我的书斋.....	(166)
后记.....	(169)

一晃六十年

解放前十四年

1936年，我是重庆市巴县中学的一个不争气的学生，年岁已经17了，还读初中二年级，同比我小得多的同学坐在一个课堂里听课。17岁才读初中二年级，一方面由于家境贫寒，入学较晚；更主要的，是我的功课不好，每学期都要留一次级，上到二年级，已经入学三年多了。说功课不好也不尽然，语文课我在班上拔尖的，作文老是满分。有一次语文老师发还作文本时说：“我真想给你打120分！”可算术课，每次考试却都是50来分，从未及格过；其他几门功课也学得不好，当然只有留级了。

那时候，学校兴办墙报，是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把自己满意的作文，抄贴在墙报上；也有专写的，大抵是些长短句新诗。在我们班的墙报上，还有议论时事的短文，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求抗日救亡之类。我在学校的时间和精力，多半用在了办墙报上。

重庆市几家报纸上，都有副刊。我的同学温厚华，他叔父温

嗣翔是商务日报的副刊编辑。经过厚华的介绍，我学着给商务日报副刊写稿。真没想到，第一份稿件就被采用了。题目是《不是“呐喊”》，署名“西洛”，内容是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我在学校的名字叫张国华，离开学校后就改名张西洛了。为什么改名张西洛？是我读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书中有个很可爱的少年叫“西西洛”，我就用了他的名字。

向副刊投稿，使我开始同报纸结下了因缘。当时就想：要是能到报社当个记者该多好！我永远要感谢的，是商务日报副刊编辑温嗣翔，倒不是他在他主编的副刊上采用了我的习作，而是因为他鼓励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看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还把一大本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借给我阅读。还有商务日报记者陶敬之，他手把手地教我写新闻，要我把学生的救亡活动写出来，由他修改，刊登在商务日报上。他二人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只不过比我大三四岁；可当时我是非常崇敬他们的。自然现在也还是这样。可惜陶敬之于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壮烈牺牲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为创建人民共和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已有几年了。日寇不仅占领了我国东三省，炮制了伪满洲国，还觊觎华北，炮制冀东、内蒙伪政权。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浪潮风起云涌，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已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和巴县中学的一些同学，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经常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事政治，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6年春，国民党给巴县中学派来的新校长吴人初，是一个中统特务，来的任务不是办学，而是镇压学生运动。他到职不久，就借口我们闹学潮，不守校规，把我和另一位同学龚远英（现名罗焚）一起开除。

那时候，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别的学校是不收的，从此我们就失学了。但也正好全身心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在新蜀报主笔、重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漆鲁鱼等人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重庆救国会”，专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时间是1936年7月到11月。

这时，我的父亲失业在家，母亲是家庭妇女，一个弟弟8岁，家里生活异常困难，经常是无米下锅。一家4口人不能不吃饭，我必须找个职业。因为我同商务日报、新蜀报有投稿关系，重庆救国会的领导人又多是新闻界的，加之我又向往着当一名记者，他们就介绍我到一家新创办的小型日报齐报去工作。我已经是18岁的成年人了，少年时的艰苦生活，锤炼了我的意志；两年多在学校办墙报积累的经验，使我一到报社，就适应了记者工作的要求，一天能写出两三条新闻稿。

齐报是一张同人报，是由商务日报、新蜀报的编辑、记者合办的，参加工作的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齐报兼职的人不领工资，我和我的同学温厚华当记者，没有其他职业，有一点微薄的生活津贴。齐报的编辑方针，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报道日寇侵华动向和我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活动，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等等。总编辑是商务日报主笔王达非。他在重庆各报中，首先采用本报专论、本报特写、本报专访等形式；文章短小精悍，版面生动活泼，编排独具一格，深受读者的欢迎。

由于齐报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报纸出了不到半年就被勒令停刊。我失学不久又失业了。

我离开了齐报，失业半年多。1938年4月，由南京迁到重庆复刊的新民报，在报上登出启事，公开招聘记者；我去投考，居然被录取。那年5月1日报到，仍然是当记者。

我在新闻界近60年，自己办过报纸，也同别人一起办过报

纸,担任过社长、经理、副总编辑等职;但我多半的时间和主要的工作,还是搞新闻采访,长期不停地为采访新闻、撰写新闻奔波。近年,我虽已年逾古稀,仍在采访第一线,坚持写“本报消息”。我认为,一个记者首先是要写消息,而且不嫌弃写短小的消息;如果新闻记者不写新闻,就不成其为新闻记者了。

50多年,我写了很多短小的新闻。因为短小,虽时至今日,我仍无法把它们辑集出版。但我并不后悔。我一向主张并坚持新闻记者首先是写好新闻,特别是短小的为读者所欢迎、所爱读的新闻。

50多年,我写的各种新闻不下万件,但能记忆的不多,很多也无法查找了。这里谈谈解放前我的记者生涯中的几件往事。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政府即已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把重庆定名为“陪都”;国民党的要员们,纷纷从南京、从武汉到了重庆。

1938年到1941年,我作为重庆新民报和中央日报记者,同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都有过接触;还采访过后来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对这些人的采访,多半是官样文章,发的也大都类似公报新闻。但是有几件事,却是我至今未忘记的。

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青木关召开国民教育会议,会期五天。会议议程的最后一天,是蒋介石到会讲话。

青木关离重庆市区有几十华里,我同大公报、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六七名记者住会采访。一天下午,我无意间走进会议秘书处的办公室,看见一个男青年在刻蜡版,一个女青年在油印。我顺手拿起一张印好的看看,原来是蒋介石第二天的讲话稿。在讲话的前一天获得讲话稿,而且是蒋介石的,对一个新闻记者来

说，简直是意外收获。为了弄到这份讲话稿，我一边压抑着心中的兴奋，一边帮着女青年整理纸张和印刷。待到讲话稿印完，我便顺手取了一份，跑回住处，在讲话稿前加了一个新闻导语，放进信封，一口气跑到青木关汽车站。新民报社在市区七星岗，正好是这趟汽车的终点站。我央求司机车一到站立刻把这封信送到报社。我塞给司机一点钱，请他务必把信送到总编辑赵纯继手里。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到会了，完全照印好的讲话稿念了一遍。当天的新民报，几乎是和蒋介石讲话的同时送到了青木关。我翻开报纸一看，在头版头条显著地位，用大字标题把蒋介石讲话全文刊载出来了。而重庆其它各报，到第二天才采用中央社的通稿，把蒋的讲话刊登出来。这天，新民报却只发了一个简短的消息，注明“讲话全文已见昨日本报”。

我抢到了一条重要的独家新闻，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一起在会上采访的同行们，也称赞我手快，腿快，投寄办法巧妙。可是会后回到报社，报社社长却一盆冷水冲我泼来：“你真大胆！如果那天蒋委员长临时不去了，或者去了他不按讲话稿讲，我们这个头条消息可怎么交待？！怪罪下来，我这个社长又怎么交待？！”这种事情在蒋介石时代确实是时有发生。顿时我也出了一身冷汗，感到是有些冒失了。这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1938年秋，我访问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他算是国民党中的一位忠厚长者。一天，我向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了采访林森的要求。这位平时不喜欢接受记者采访的国家元首，居然答应了。那时候日寇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国民政府的头头们多住在郊区。林森同意在他的山洞官邸林园接见我。

从城区到郊区山洞，有几十华里。山城重庆的交通十分不

便，是这位长者派副官用他的轿车把我从城里接去的。

进入林园，来到客厅，慈祥端庄、一口银髯的林主席，已在那里等我了。

话就从重庆的交通谈起。林森说：“你在路上走了很久吧，公路还好修，只是扬子、嘉陵两条江，把重庆切成了三块，交通不便。能在这两条江上修起大桥就方便多了。”

第二天，我在新民报上，把林森提议修大桥的事，着重地写在我的访问记中。这样的倡议，当然是很得人心的。

当天，我把登载这篇访问记的报纸送给了在重庆的中国桥梁公司工程师茅以升，想听听他对林森的倡议有何意见。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抗战前曾设计建造了杭州钱塘江大桥。就在当天下午，我便收到了茅以升给我的回信。他十分赞成在重庆的长江上架一座大桥；并且表示，他愿在工程技术方面为此尽力。我又把茅以升的回信，刊登在新民报上。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任何进展。林森只是个挂名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茅以升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除了能贡献技能外，其它则无能为力。重庆修大桥的事，就再也未被人提起了。

1940年，我对陈立夫做了一次报道。陈立夫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喜欢同记者打交道，目的是找机会多为自己作宣传。那年7月，重庆各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了。教育部在学田湾教育部广场召集全体应届大学毕业生，听陈立夫部长训话。陈立夫在训话中叫同学们要团结，要奋发。有的国民党官员喜欢在讲话中夹几个英语，以表示自己很有学问，陈立夫就是其一。陈立夫训话说：一个F加一个F，就是大F。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大F，国家才能强盛。他是浙江人，说的F，本来是Force（力量）的缩写。可是同学们听来，成了一个Wife（妻子）加一个Wife，就是大

Wife 了。结果引得全场哄然大笑。

回到报社，我就此事写了一条“花边新闻”，登在第二天的新民报上。那时的花边新闻是很有读者的。

这当然是带有一点讽刺意味的“花絮”，但仍然不过是“花絮”。在国民党统治区登载这样的稿件也是要承担风险的。结果还好，教育部只派了它的主任秘书到报社来，找社长表示不满。

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也写过这类花边新闻。其目的，当然有献上一枝“无花的蔷薇”之意。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在 20 岁和 21 岁的那两年，先后访问了彭德怀和毛泽东。

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司令。据可靠资料，他曾多次代表八路军同蒋介石就两军联合抗日的事进行会谈。1938 年 12 月初，他在西安同蒋介石会谈未获结果，约定在重庆继续会谈。12 月下旬，彭德怀应蒋介石之邀，到了重庆。

我同大公报记者彭子冈从八路军驻渝联络处负责人周怡那里，得知彭德怀到了重庆，便想去采访他。经过周怡联系，得到允许，但事前打招呼说，军事将领的行踪要保密，谈谈可以，不发消息。能见到彭大将军是我们的幸运，不发消息就不发消息吧。

一天下午，子冈和我按约定时间到了苍坪街新华日报营业部。一位青年陪我们坐在屋内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周怡陪着彭老总来了。他微笑着同我们紧紧握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让你们久等了哟！”

彭老总从华北前线风尘仆仆来到重庆。他应我们的请求，介绍了晋察冀边区、晋东南和晋南抗日根据地、晋绥根据地等和整个华北战场抗日战争的形势。那天采访出来，天已黄昏，我们各自返回自己的报社。我整理了彭老总的谈话记录，可惜必须遵照

事先的约定，不能公开发表。但那一次的采访对我认识抗战形势，增强抗战信心，学习辩证法，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的记者生涯中最高潮，是1939年9月访问毛泽东。

1939年6月，国民党主持的全国抗敌将士慰劳总会，组织了两个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分两路到长江南北各个战区进行慰劳。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和新民报记者的我，是北路慰劳团的随团采访的记者。慰劳团在陕西、河南、湖北、山西进行慰劳活动后，要到陕北榆林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对邓宝珊部进行慰劳。这时，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在西安已同我们一起活动了。从西安到榆林必须经过延安。慰劳团决定在往返榆林的途中，都在延安停留几天，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9月14日，我们从榆林返西安，途中又在延安停留了几天。

我们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刘尊棋提议采访毛泽东，请他发表谈话。当天晚上，我们三记者商定了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二天，向经常陪同我们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几位负责同志，提出我们访问毛主席的请求，并递交了问题表。很快我们便得到了答复。一位负责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我十分欢迎记者们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们谈一次话。”并定于16日下午6点钟，在记者们的住处——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见我们。

毛泽东会见三记者的事，我有一篇专文，这里不去多谈它。毛泽东这次的重要谈话，延安的《新中华报》，解放区所有的报刊，在国统区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这篇重要谈话，后来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解放前的14年中，我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是用在自己办报纸和办刊物上。1941年8月，我离开中央日报社后，到重庆附近的江津县去办了江津日报，担任副社长，同时为报纸写些稿件。两年之后，我又到了成都，创办了星期快报（周刊）。这是一个四开的报纸型周刊，风格受新民报的影响。我聘请了新民报主笔、著名的小型报专家张友鸾先生担任主编。在办这个周刊的同时，我还编辑出版了四本小册子；报纸和这四本书，都很畅销，甚受读者欢迎。

抗日战争胜利后，星期快报停办。1945年12月，我应四川省乐山专区刘仁庵专员的约请，到乐山去创办了乐山专署的机关报立言报。我从组织编辑部班子到招聘印刷工人、购买纸张和印刷机器都全力以赴；短短一个月的筹备，报纸就正式出版了。可是，很快刘仁庵发觉我与他在政治主张、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办报方针上分歧很大。1946年3月，就借故为难我，使我干不下去。我又回到成都，与志同道合的王达非、安新贤、李与初、吴汉家、陈泽昆、王家鼐、蔡应同等，创办了工商导报。这张报纸于1946年4月28日创刊，开始是四开晚刊，后来发展到既有四开的晚刊，又增办了对开的日刊，合在一起，日发行量超过一万份。这在当时是很高的销售量了。我在这家报社，开始是担任社务委员兼采访主任，不久因为经理中途撂挑子，总经理王达非把我调到经理部接任经理，直到1952年6月我离开成都到北京。

解放后，有的名人辞典或别人撰写的文章中，称我为“报业家”，这是我很不敢当的。我在解放前创办江津日报、星期快报、立言报、万象十日画刊和合办工商导报的工作中，也确实显露了我有一些经营管理才干。这四张报纸和一份刊物，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的。拿工商导报来说，从我于创刊一个月后担任经理算起，大体上我抓了这样几件事：一是重视职工福利，尽力让大家

生活有保障，收入逐年有增加，工作安心、热心、专心。那时候，币值天天贬，物价天天涨，今天的10元钱可以买10斤大米，明天可能就只能买5斤。为了使工资保值，我在报社发行“保值券”以代替伪币。保值券以大米和棉布两项的价格为基数，把每个人的工资折合成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等量物资，而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关心职工生活，加强了凝聚力。二是钱从何来？工商导报是一张同人报，开办时只是王达非、安新贤、李与初、安克谐四人，从他们的积蓄中各拿出一点钱来，租了几间房子，买了点家具，购置了纸笔墨砚剪刀浆糊，凑合着编报。自己没有印刷厂，报纸委托别人排印。我着重抓了扩大发行和招揽广告以增加收入。由于我同成都工商界比较熟，订户很快增加，订阅与零售加在一起，由2000份增加到了四五千份，是当时成都17家报纸的第三位。报纸发行量大，别人自然乐于来刊登广告。这时，报社的经费不仅能自给，创刊一年后，就自己办起了有几千磅铅字，两台对开平版机，有化铅、铸字、打纸型等设备的印刷厂；并且增出了对开的工商导报日刊。这时，日晚刊加在一起，发行数超过万份，广告费收入占总收入的60%，为报社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三是同编辑部的同人一起，坚持了办报的进步方向，这是报纸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更加露骨地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不但闹得民不聊生，民族工商业者也生存不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商导报“在商言商”，大力支持民族工商业者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保障他们的权益，为他们讲话。这样，工商业者不但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报社，在政治上也同我们站在一起。据最近看到的材料，当年的四川省特务机关，把工商导报列为“伪报”，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

解放前14年，由于我的政治态度和所从事的工作，不断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有三次我险遭毒手。1943年夏天，我在

江津日报社时，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派了特务来到江津县，抓走了江津日报社长刁之鲜、总编辑王野晴及江津中学校长、教师等5人，我因患伤寒病后，到乡村疗养，特务找不着我，幸免于难。1947年6月2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几个大城市进行大逮捕，即有名的“六二事件”。成都的特务指名要抓我，我在5月27日已离开了成都，才免遭毒手。他们从工商导报社抓走了两名编辑、记者。1949年11月，成都临近解放，国民党反动派愈加疯狂，每天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的立即加以杀害。我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并且得悉，还把我的照片加印了若干，发给成都城门守卫，注意捉拿。我知道这个情况，同报社的几位负责人商议后，同妻子一起，带了刚满岁的儿子，装作回娘家巧妙地通过岗哨，到成都远郊区的赖家店躲了起来。

成都工商导报由于解放前坚持进步方向，在四川发行多，影响大，1949年12月30日成都解放后，军管会立即批准工商导报继续出版，是解放后成都报纸得以继续出版的第二家。第一家是成都新民报，但该报只继续办了不久，便自动停刊了；而工商导报用原名办到1956年4月底，整整10年。

我在国统区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成都刚解放才4天，1950年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从北京发来电报，原文是：“成都工商导报社张西洛先生暨全体职工：敬祝解放”。署名是新闻总署署长和副署长胡乔木、范长江、萨空了。这封电报删去了我的名字，刊登在1月4日工商导报日刊的报眼上。1986年6月，经全国政协机关党组的审查，批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1936年7月参加“重庆救国会”时算起，属红军时期的干部。

解放后四十五年